

## 汇聚历史风云的力作

——读国运

□陈建功

近年来,广东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等文体,都有很丰硕的成果,而报告文学或非虚构文学领域,更是成果斐然。广东拥有连获三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就充分说明了广东报告文学作家的实力,不仅如此,广东还出现了许多报告文学或非虚构类的作品,比如廖琪等的《感动》、廖红球主编的《守护生命》、林雨纯的《天地男儿》、李兰妮的《旷野无人》等等。当然,吕雷、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也是个中翘楚。2008年,举国上下都在进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系列活动,对30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探索创新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回顾和总结。吕雷和赵洪的长篇报告文学《国运——南方记事》,应该说是应运而生的。这部作品,以改革开放前省广东为切入点,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缩影。这部作品,写得恢弘大气又生动感人,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项目,应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别项目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省份,30年来从来都是冲锋陷阵的实践者和新鲜经验的提供者,同时也为我国的改革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吕雷和赵洪,作为在我国文学界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敏锐地发现了广东改革进程的时代意义,通过多年的积累和采访,终于完成了这部全景式反映广东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力作。多年前,吕雷与赵

洪合作,推出了长篇小说《大江沉重》,为我们塑造了风貌别具的改革者形象,展示了广东改革开放的风云。《国运——南方记事》堪称是《大江沉重》的姊妹篇。两位作家再一次连袂,用另一种文体,表现他们拥抱时代的激情。

翻开这部书,我感觉作家的激情如江河般涌动而来,把我带回到30年的风风雨雨之中。这本书从中国寻求复兴之路的历史必然,揭示了改革开放如何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从中国人民寻求幸福和谐生活时代呼喊,揭示了改革开放如何反映了民意、激励了民心,从改革步履之艰难志士仁人之无畏,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率领人民开创新生活新时代的勇气与智慧。应该说,这本书真正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的主旋律。

构成这部作品的一个最鲜明的艺术特色,是它浓重的感情色彩和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作家采访扎实深入,甚至到当年的档案、信件和会议记录中去钩沉索引。素材丰富,剪裁得当,作家截取了最富于信息量和最能传其神韵的情节和细节,生动地再现了我们知之不详的历史瞬间,再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性格风貌。《国运——南方记事》中有大量翔实的数据,但它又不是简单的资料的堆积,并没有就事件写事件,而是将视角转向事件的背后,将笔墨对准人,最终决定作家笔墨向向的,是感情,最终催动的,也是读者情感的波澜。作者以情驭文,时代生活在他们的笔下呈现出感人的温度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 纪实文学的当下政治性

——读《东方光芒》 □陈晓明

《东方光芒》无疑是对广东东莞改革开放历史最全面深入的表现,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来讨论,很容易提出这部作品的社会价值。

《东方光芒》写了很多领导人、基层的和上层的领导人,几乎是在为领导人参与改革开放实践树碑立传。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历史是小人物的历史,是弱者的历史。这是现代以来的文学建立的观念。如果是英雄史诗,是大人物的历史,那已经严格让位于传记文学。我们怎么认识中国当代作为一个政治很强大的社会,这些政治领导人,上层的与基层的,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所起到极其独特的重要作用。文学作品要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那些变迁的极其复杂和艰苦的过程,就不能不描写这些政治人物和基层干部。写出他们以个人的独特作用,去开启体制封闭的世界。这就是作为纪实、报告文学——非虚构文学存在的价值。这样来看,以文学的方式来命名它们,这在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中都有它的价值。

在中国当代整个改革开放进程中,政治就是一个巨大的内驱力。我们所有的历史变革的动力其实是来自政治。我们说广东、深圳作为特区,它的内驱力使它的改革产生,所以在这个定位上我们才能去看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广东纪实文学的成就,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很有意义。如果我们不从这点去阐释它,就不能揭示它真正的意义。如果作为一个历史记录的话,那有新闻报道,还更加完整,或者说更加真实,然而恰恰它是从文学的意义上去表达这样一个政治的梦想。

我以为《东方光芒》就是表现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政治的意志和人民的意志结合到一起所产生出来的巨大的现实能量。以《东方光芒》为代表的广东纪实文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确立了它独特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别的地区的文学虽然也有类似的作品,但没有广东文学这么有意识、这么自觉、这么有规模效应地做到这一点。广东是直接鲜明地、彻底地、全面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以《东方的光芒》为代表的广东纪实文学的贡献。

如果西方要研究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而不研究广东的纪实文学,不研究《东方光芒》这类作品,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可以当做政治历史文献和政治哲学、社会学的珍贵文献来看的。它包含了整个历史在这样一个时期的内在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历史内在必然要求,政治意志与人民意志结合起来所造就的一种历史趋势。

当然,从文学的意义上,《东方光芒》是写出了改革开放开拓者家族的群体雕像,这是接过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文学的旗帜。以非虚构的方式重新建构这个改革时代的开拓者家族的形象,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东方光芒》写得非常精彩。何建明在报告文学方面是非常成熟的作者,他在报告文学方面的手法、语法都非常老到。这部书的合作者朱子峡也出手不凡,很大气,写人物和写事件都很见功力。总之,这是一部相当厚重的优秀的报告文学或者说非虚构文学作品。

作家刘迪生的报告文学以饱满的热情和生动的描写,讲述了一名普通的志愿者赵广军的感人故事,讴歌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爱心,讴歌了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好道德,讴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讴歌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貌和精神。这是一部思想主题突出鲜明又具有优秀思想品质的好作品。在我们社会的建设进程中,特别需要这样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点亮生命》——赵广军和他的志愿事业》主题突出,讲述了一个社会小混混、问题青年如何成长为一个有爱心有道德受人尊敬,为社会建设做出自己应有贡献的优秀志愿者的历程,着力塑造志愿者赵广军的报告文学形象。作品重点描写了赵广军开办生命热线帮助无数社会问题青年点燃新的生活热情,重新获得健康人生的事迹,反映传统美德在当代的传承,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人民群众的积极践行中深入人心,发扬光大。赵广军身上的这些品质,是报告文学塑造人物的思想基础,也是报告文学主题的思想之魂。我们认为,赵广军这个形象立得住,有价值。

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在描写人物过程中,注意探索志愿者事业和我国社会建设的规律。志愿者事业在我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还有许多理念需要拓展,还有许多规律需要探索。我们注意到,作家在介绍赵广军工作经验时,讲到他发明的三种有效但却很朴素的方法——“金钱拉拢”、“情感拉拢”、“恐怖拉拢”等。这些方法看上去可能很有效,但从社会建设以及志愿者理念发展中,也许还值得

## 《袁庚传》引出的思考

□吴秉杰

读涂俏的传记文学作品《袁庚传:改革现场1978—1984》,我想从最直接的感受说起,评论与创作一样需要经验和感性的积累。

涂俏的作品留给了我很多好的印象。首先,自然是因它塑造了袁庚这样一位生动的领导干部、改革家的形象。塑造人物不能“一分为二”地提供有关他的正面信息或“负面信息”,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分割其优点与缺点,这是报告的分析方法,而文学形象的创作法则,则应是在人物的“特征”中,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命信息。涂俏笔下的袁庚便是这么写的。例如,没有袁庚的“霸道”,就没有其改革;没有他的处处要权,向中央要权,与深圳市委闹矛盾,被斥为搞“独立王国”,可能也就没有蛇口工业园区的迅速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才树立了起来。写改革人物,还要表现出他人际关系的处理,因为改革的生产关系本来就是指的人与人的关系。没有得罪人,不可能有改革;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也就谈不上公正的采访。我认为涂俏也做到了这一点。涂俏的代后记中列下了她所采访的156人的

## 一个人和一本书的传奇

——《庄世平传》读后 □张培忠

在色彩斑斓的传记文学谱系中,廖琪的《庄世平传》有着别样的质泽和深刻的内容。作家透过庄世平的精神内核折射了一个民族的辉煌,聚焦了一个时代的风云。

传记文学这种题材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一开始便获得了为虚构性文学所没有的“优越”之处。首先,是题材对象的知名度高,为世人所熟悉。一般而言,传主不是政坛领袖、商海奇才,就是学界巨擘、艺苑翘楚,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具备某种传奇的成分。《庄世平传》是契合这种题材特征的,作为一个著名的爱国者,庄世平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由于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在海外侨胞、港澳同胞中更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是现任和第三、四、五届全国侨联副主席,还拥有众多的社会兼职)。其次,是题材对象的“含金量”重,哲理性强,伟大人物常常与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往往蕴含深沉的历史思情,值得作家做全方位的开掘。庄世平的一生与香港结下不解之缘,他在香港上空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他第一批获授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他第一个向中央提议在古都西安建立“香港回归纪念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庄世平已经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香港联系在一起,而民族大义始终萦怀于心。

但同时也要看到,传记文学的题材对象是一个优势和局限并存的混合体,其题材属性要求作家既

要注重时代背景和生活事实的真实和准确,又应当像小说家那样追求人物形象的鲜明和完整,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写作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题材对象是人所共知的名人,从接受美好的角度看,读者已预先产生了较高的心理期待,但在阅读时,因为熟知人物的故事梗概,缺乏一种审美的距离,从而失去了艺术欣赏中所不可或缺的陌生化效果。廖琪在这两方面的处理上做到扬长避短,显示了独具慧眼而又深具意味的文学选择。

首先,《庄世平传》突出的是一片陌生的领地。从庄世平富于传奇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家,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但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不是走向冲锋陷阵的国内主战场,而是另辟蹊径,到国外,到港澳去办实业,联络华侨,筹集经费,通过外围的运作呼应中心去发展。庄世平的形象是集侨领、革命家、爱国者于一身的复合的形象,庄世平的历史是融铸了华侨史、革命斗争史、英才成长史的一部交响诗。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庄世平传》区别于以往那些单纯的人物传记。

其次,作家强化了题材本身和时代关系的功

能特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廖琪认为,文学的功能和责任,不在于历数奇迹,而在于叙述奇迹背后的艰辛与运筹,从而揭示一个时代和人物的辉煌。庄世平作为一位长期活跃于港澳的金融家、银行家,他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实践,对改革开放的真知灼见,都是内地正热火朝天进行着的现代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廖琪把它作为其中一条主线贯穿全书,以凸现人物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互动关系。这部传记的意义,不仅在于为我们留下某种理性规范、某种行为模式,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提供可供借鉴的文本。

再次,作家与传主的互渗交融达到了异质同构。作家选择传主,传主也在选择作家。廖琪的执著、朴实、机敏获得了庄世平的信赖,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在这里,主客体遇合、默契、交融渗透的程度愈高,作家的潜能就发挥得愈好,题材蕴藏的意义就得到更广泛的开掘,作品成功的可能就愈大。

所有这些,都为廖琪建造庄世平这座精神之塔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庄世平传》中,廖琪成功地达到了他的创作目的: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既重视描摹人的历史的轨迹,又致力于历史的人的定位。整部作品的风格是一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历史叙述。真实的是最好的,这就是《庄世平传》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也是廖琪成功地建造这座精神之塔的秘笈。

和社会情态,“路”体现着最为本真的中国。“中国”正是在“道路”上得到最恰如其分的表达。各种路上的信息与状态展现为一种由地域和社会条块组合而成的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的应对冰灾的力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结构及其力量的释放依托于对冰灾的应对与克服过程中的情感与行动,用本书作者的表达就是“燃烧”,是置于冰点之上的燃烧,这种燃烧的本质依然要从中国的本质、中国道路的本质上予以解释,那就是我们的族群,每一位成员,都趋于一个整体,趋于一种联合、扶危救困,社会至上,以人为本,仁爱之路,国家与个人和谐,人力与天力求得平衡。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样整体的路上寻求个人的位置,丰富个体生命的性情,实现个人的生命与生活价值。这些在本次抗大冰灾斗争中“燃烧”出来的中国主题富于价值,正体现出本书的纪实纪事纪史的初衷与功能。我们读这本书,通过这本书来思考我们的“中国”。我们从这里来,我们依然在路上。

## “路上”的中国

——读《冰点燃烧》 □张末民

一场80年不遇的大冰灾。《冰点燃烧》一书的主题正是围绕这场大冰灾与对这场大冰灾的克服之间展开,其核心是一种道路困局,涉及铁路、公路、供电线路、媒体网络、行政管理网络、救援保障网络、领导网络、民生服务网络、维护社会秩序网络,乃至地域山川形势、人生情感起伏,回家的路、团圆的路,焦急、伤困、希望和温暖的路。依路可以远足、打工、商贾、访亲友,识见天下之奇,也可以还乡、回家、归田园,省亲父母兄弟姐妹,团聚和安土厚生。中国人离不开这一条条大路小路,山路小路、情路心路。所有的面孔和故事都呈现于路上,路的各个节点上有真实的人生

## 用思想穿透文学

——读《中山路》 □李朝全

作为一位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杨黎光还是一个深刻的思想者、时代的背负者。他总是能抽身于时代与人群之外,对自己所描写的对象进行理性的追问和思索,对具体的人和事进行独立的反思,判断是非真假善恶美丑,探究事物本质;更能不局限于具体的时代,去进行形而上的哲理性研究,探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及真理。他第一部受到广泛关注并获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副题是“深圳市计划局财贸处处长王建业特大受贿案深探”,追问王建业犯案的思想根源,探究人性本质,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法制探案报告,对反腐题材创作有着长远的借鉴意义。《瘟疫,人类的影子》则以独特视角,在人类瘟疫史的背景上,追溯非典根源,分析疾病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赋予了作品鲜明的理性思辨色彩。《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围绕着遍布世界各地的187条“中山路”这个“文眼”展开,遵循着孙中山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和现代化道路先行者的足迹,通过选取若干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以编年的顺序书写近代中国历史的一次次波折、转折和转向,反思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最终归结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是一部试图为百年历史

发展进程进行总结的文学专著。

杨黎光还非常重视创作上的创新。文学创新,可以是开掘新颖、新鲜、新奇的题材内容;也可以是叙述描写视点、视角的转换;还可以是写作方式、手法、语言、艺术形式等方面开拓。《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脚印》似乎是一次“命题写作”,但却是一次富于新意的创作。作品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中山路”,开篇引用丘树宏的同名诗歌,构成贯穿全书的主调与基调。“中山路”在此无疑语意双关,既可指遍布各地那一条条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道路,亦可喻指中山先生倡导和开创的民主共和、现代化之路,近代中国波澜曲折的现代化历程,提纲挈领,统摄全篇。

杨黎光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为我们指明了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是这样的:首先,他须具记者的素质。他要有记者的敏感、敏锐和敏捷。他是时代的书记员,文学的尖兵和轻骑兵。其次,他应是一名战士,有战士一般正视真实、与丑恶抗争的勇气和胆略,有战士对于崇高理想信念的执著与坚定。再次,他是一名运动员,有足够的体力和耐烦之心,经得起长跑式的颠簸劳累和无聊。他还须是一名法官,掌握着社会良知的天平,判断世间的善恶是非。当然,他必须是一名文学家,善于运用文学艺术的十八般武艺从事报告文学创作。至为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作家要有大悲悯情怀,他从不漠视人间苦难,而始终以一己之力,真诚地记录生活,参与生活,加入到时代艰难前行的大潮中。

李春雷是近年成就颇丰的年轻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和蝉联两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他的《木棉花开——任仲夷在广东》出版后获得多方好评。任仲夷是一位站在改革最前程,为当代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政治家,正如李春雷所说:“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历史条件所能尽到的最大责任。”

不仅如此,我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少会像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那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动地刻画了任仲夷这样一位改革家,再现了这场伟大变革的风起云涌的历史画面。这部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课题,我只想就它所引起的我有关报告文学的文体问题,谈几点想法供大家讨论。

近年来,报告文学越写越长,报告文学的文体范围也越来越广,除了我们曾熟悉的《哥德巴赫猜想》式经典文体样式,纪实文体、人物自传、地方史、家族史、创业史、行业巡礼以及诸种非虚构写作,均同或当做“报告文学”。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报告文学的家族扩大了,范畴模糊了,同时勿庸讳言在文学界特别是读者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相应下降。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再次让我想到这个问题:报告文学的文体应有什么样的特质?

其一,报告文学首先具备向读者“报告”的特性,它应当是读者关注的当下正在发生或刚刚发生过的影响社会进程和发展的、人物、事件及重大社会现象。报告性要求,新闻事件的延伸和追踪,现实生活的深入与调查。真人真事当然是第一性的,除了真人真事,还应当是读者关注的与时代社会发展进程有关联的人与事、现象与问题。《木棉花开》写任仲夷,这就具有重大的“报告”性,因为任仲夷的经历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牵动每个中国人的神经。

其二,报告文学必须是向读者进行的文学“报告”。文学性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前提。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就是要写活人物,写好故事,讲究文学的表达方式。写好人物是核心,《木棉花开》的开篇就是:“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几乎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没有人,写不活人,作品难成功。任仲夷日理万机,千头万绪,李春雷写的“鱼骨天线”事件,“二进宫”事件,几件事浓墨重彩,一下子人物就立起来了。我相信,《木棉花开》是真实的,但我也知道,我是跟着李春雷的心去接近这种真实。

其三,报告文学应该惜墨如金,在尽可能短的篇幅中完成对事件与人物的介绍,以尽可能短的篇幅征服读者。李春雷两万多字写了任仲夷,够精彩,这就叫报告文学,如果他写50万字,我想也能有足够的素材,但我认为那是“任仲夷传”,是传记文学了。

在纪实体和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的今天,李春雷的《木棉花开》启示之一就是:报告文学应该强调它的文体三要素:报告、文学、篇幅。

## 赞美平民爱心 反映时代精神

——读《点亮生命》 □木弓

讨论。然而正是赵广军的敢于探索,不怕争议,为我们志愿者事业发展积累了经验,寻找了规律。由此,这个报告文学的形象更具个性化,更有特点,也更有艺术感染力。

报告文学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现实生活的真人真事,反映时代精神,反映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这些年来,报告文学确实为社会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自身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例如,我们一些作家过多地关注那些企业商业创意“精英”的贡献,把更多的笔墨放在展现这些人的身上,以为这就是反映时代精神和生活本质,从而忽略了普通人民群众创造生活的主导作用。其实,这类作品过多,也会产生一些思想误导,我以为事实上,误导已经存在了。值得我们去高度评价的是,刘迪生坚持把目光放在一个很普通的志愿者身上,通过他那一点一滴的爱心行动,让我们感受到来自人民的伟大精神和力量,看到了这些生活在基层默默奉献的普通人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境界,也认识到正是这些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时代精神的主体,他们更有资格被称之为时代英雄,从而帮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生活和本质。

名单,按时间先后,而不是按重要性、地位高低排列,这点也让人有好感。她说,对于拒绝了她采访要求的人,她也感谢,因这使她写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更加兢兢业业。在我所有所读过的关于深圳特区改革这一时段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提到胡乔木赴蛇口参观视察时,都仅是写某“中央要员”而不名,言词也暧昧,惟有涂俏的作品实录下了人和事及胡乔木的原话,更能引发读者的思考。

许多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一些传记类的写作,都具有一种“揭秘”的性质,这似乎难免,且通常也是它的价值所在。《袁庚传》也有此类价值。

涂俏的工作是一次抢救记忆的写作。她吃亏在于写得比较晚,再要求新意,难度更大,但尽管如此,作品还是提供了许多鲜活的细节、情感和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周为民间事件等)。在我看来,纪实类的传记或报告文学的写作,既要严格地服从事实,又要侧重于对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开掘,由此才能形成人物后续命运的轨迹。历史上,既有弱者的悲剧,又有强者的悲剧,还有许多不同的人生的曲折、命运的浮沉,如果不是仅仅从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予以报告,还要加上文学的角度,那么,这种内心或精神性格的开掘便是不可缺少的。

《袁庚传》的写作,不能说它解决了当前报告文学写作中的所有问题,但它的成功则可以证明,它不是一次简单性的“写作”。